

# 忆王凤梧先生

刘泽林

—

我与凤梧先生的师徒之谊源于一张文学小报。

1982年，我到《丑小鸭》杂志社实习。半年后我们那批奇货可居的大学生便要学成就业了，在杂志社，我极偶然地看到了一张8开4版的文学报纸，上面散发着浓郁的家乡气息，细看出版处，果然是房山文化馆主办。那便是《青峰》了。我记得那一期上有凤梧先生的一篇小说。

这一次偶然的机缘，无疑改变了我工作的取向。当年国庆节前后，我携了一篇习作敲开了房山文化馆院内的一扇木门，迎面端坐在一张木椅上的是一位粗胖的老者，那便是凤梧先生。

那篇习作日后并未发表，只是记得里面似乎赞美了一种短命的花朵。但究竟是一种什么花，现在也已忘却了；也许是我臆想中的花朵吧。但它肯定是一种非凡的花：在公园，或者在闹市间；在花田一隅，或者干脆就在小径的两侧，它悄然而生。待人们看厌了那些名贵的花朵，它便在一个不经意的清晨，悉数绽放；然后极尽灿烂之能，只繁华几个白日后，便在一个寂静之夜悄然而谢！

凤梧先生看完稿子，抬起头，开始认真地审视我，问：“这是你写的？”潜意思好像是我抄袭来的。

我枯坐在先生对面的椅子上，硬声回道：“是！”

先生摇一下头，又点一下头，说：“二十岁的人却有五十岁的心境，难得！”

原来先生是对作者的心境有所疑惑。

凤梧先生没有发表我那篇作品。他说：作品太沉溺于凋谢了，我不能助长一个年轻人热衷于凋谢。不过，那的确是一种境界！然后先生在尾页的空白处，工整地写了几行字在繁华间绽放，于寂静处凋零——此乃生死大境，吾辈亦当如是。

几番访谈之后，彼此已经有些默契了。

凤梧先生问我：“毕业去哪儿？”

当时，我毕业分配已经有了好的去向，但却鬼使神差地答道：“还没想好呢。”

凤梧先生说：“到文化馆来吧，跟我一块儿编《青峰》。”

一念之下或者一念之差，我真的便选择了文化馆，从此便与房山文学再也脱不开干系了。

说凤梧先生便不能不提他与《青峰》的关系，不能不说他对房山文学的贡献。

凤梧先生生于 1927 年，房山饶乐府村人，做教师时，因两篇杂文被划成“右派”，也算是“文革”前房山文学少有的成就了。“平反”后赋闲在家，等待落实政策、恢复工作。恰其时，诗人赵日升与文化馆领导访邀。日升先生说：“到文化馆来吧，编《房山文艺》。”凤梧先生遂于 1981 年到文化馆创作组工作，主编《房山文艺》；亲手创刊了《房山文艺》的日升先生便安心到《青年文学》就职去了。自此，房山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81 年 6 月，自总第 28 期始，《房山文艺》更名为《青峰》。凤梧先生说，取意《青峰》，旨在扶植更多文学新人，绝无否定《房山文艺》之意。当时，凤梧先生还声若洪钟地给我诵了两句注释“青峰”的诗，可恨日后被我忘得干净。后来，我多次见到日升先生，也从未见他对更名一事有什么介怀。可见，《房山文艺》更名为《青峰》实在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

诚如凤梧先生所言，更名后的《青峰》更加注重文学创作队伍的培养。

此时的房山文学，正孕育着第一次腾飞。改革开放后，长期禁锢人民的“极左”观念逐渐淡出人们的思想，文艺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和提高，全国文艺界迎来了新的春天，进入了全面的文艺复兴时期。与《房山文艺》的办刊宗旨同脉，《青峰》自觉地承担了房山文学创作主流基地、房山业余作者成长摇篮的历史责任。在《青峰》不断吹响的文学号角声中，一支业余文学创作大军迅速向当时房山唯一的文学载体集结，几年间便激增到数百人。我记得，当时文化馆请刘绍棠等著名作家来房山讲座，我发出去 200 多个通知，结果前来听讲的作者把一个能容纳 300 多人的礼堂坐得满满当当，那境况绝对是空前绝后了。

《青峰》不过是一个很小的“摇篮”，如何能够容纳得下那么多文学新人？凤梧先生便对那些有潜力，且已经在“摇篮”里培育了一段时间的作者下了“逐客令”：到公开报刊上去闯荡吧，好腾出版面给更多的新人。但凤梧先生绝对是要“送一程”的：先是精心帮这些作者润色出一篇好作品，然后亲笔写一封信，连人带作品，推荐到《北京日报·郊区版》去了。鉴于当时房山文学的创作水平，上大刊大报显然不够现实，而《北京日报·郊区版》是距离北京郊区作者水平最近的报纸。于是，房山作者开始陆续在《郊区版》上崭露头角，且占据的版面越来越大；很快《郊区版》也承受不住，便向其它报刊蔓延去了。随着房山作者的崛起，尤其是王刚、孙艳玲、王文玮三名年轻的作者同获“北京市建国三十五周年征文”奖，在北京文坛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被评论家称为“北京西南文学现象”，由此掀起了房山文学崛起的第一个高潮。

所以，如果说赵日升先生对新时期房山文学有开创、奠基之功，那么凤梧先生无疑便是提高、壮大之德了。

1983 年底，房山县文联成立，胡振常任主席，凤梧先生被选为副主席。1985

年胡振常因身体原因，辞去文联主席一职，房山县委决定由凤梧先生继任主席。1987年，离休的凤梧先生一心主编《大房山》报去了，《青峰》的接力棒便传到了我的手里。只可惜十多年后《青峰》终结在我手里，虽然不是我的过错，到底觉得愧对两位前贤的在天之灵。

### 三

在推进房山文学创作的同时，凤梧先生宝刀不老，笔耕不辍，短短几年间先后在多家报刊发表小说数十篇，引起全国文坛的关注，成为北京郊区的代表性作家。

关于凤梧先生的文学风格及成就，作家刘绍棠、评论家康凯等早有评述，这里不再赘言。

我所在意或者诧异的是：从1981年复出，到1990年前后辍笔，不过十年的时间，凤梧先生竟然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了几十万字的作品，一时成了北京郊区文学创作的“执牛耳”者。由此推想：倘若当年不被错划右派，那么到他复出之前的二十余年，风华正茂的先生会有什么样的文学产量和成就？

以54岁东山再起，无论从文学还是生理的意义上看，于凤梧先生都是“第二春”了，但他却让文学和生命之花在这短暂的第二春里绽放得如此灿烂。凤梧先生的创作力和生命力不能不让人赞叹。

在文学丰收的同时，先生还收获了社会和政治的成就。随着在文坛上的声名鹊起，先生在房山区域内成了一位颇有影响力的名人，随后被推举为北京市人大代表。这样一来，先生的文学精力便要分些出来，转到参政议政上去了。凤梧先生是极看重人大代表职责的。那时我去探望先生，见他在写字台上奋笔疾书，但写的却已经不是小说，而是代表议案了。我常想，倘若不是被代表牵扯了一些时间，先生的文学成就或许还会更大一些。

如同创作的题材来源于生活一样，议案的内容也需要做大量的调研。那会儿的先生手提一个皮革黑包，经常在社会各层面游走，甚至会缠住摊主小贩，随便聊些什么。先生的议案大到国家政治，小到居家琐事，范围很是广泛，但更多的还是为百姓办实事的内容。甚而生活小区的环境整治、治安等，先生的议案里都有反映。一个邻居找到先生，好像反应的是自家水管问题，迟迟不能解决，请他写个议案呼吁一下。先生笑道：一个议案专对你一家的问题？你这也太具体了。待邻居走后，先生便提包出门，直向主管部门去了，仗着熟脸和代表的身份，私下为邻居排忧解难了。像这一类琐事，先生做了不少。那会儿先生嘴边常挂着一幅对联，可惜现在我只记得下联了：“只为人民鼓与呼。”先生频繁地在官场出入，时人多有误解，都是发生在这一时段。但我知道，那时的先生已不仅是“为人民鼓与呼”，而是为了议案的尽快落实，身体力行去了。还有，当时文联无编制、无场地、无经费，也需要凤梧先生到官场游走，化些缘来。

那一时段的房山文坛，异彩纷呈，风光无限，实在应该归功于领军的先生。

## 四

凤梧先生以一介文人的形象，为“鼓与呼”之事，在官场与百姓之间往来穿梭，闪现的便不只是文坛的风景了。

一日，文化局一副局长携凤梧先生到政府，找县领导办工作方面的事。文化局领导显然很是倚重先生的一片名声和一张敢于表达的嘴。结果上台阶的时候正迎见要出门的县长。凤梧先喊了声县长，县长谦逊地回声“王老”，算是彼此打过招呼。略略寒暄几句之后，县长说：“我得赶紧下乡去了。”遂与凤梧先生握手道别。凤梧先生在台阶之上目送县长走向车旁。县长却在坐到车里之前，又向先生挥了挥手。凤梧先生自然不能失礼，也挥了挥手，同时粗门大嗓地喊：“县长，好好体察民情啊！”不知进到车里的县长听见没有，院里进出的一些人却是听到了，都在一怔间往先生身上望，好像台阶上站立的是一个怪物。一旁的副局长已失了脸色，待进楼后忍不住小声提醒道：“王老，人家到底是一县之长，您怎么那样跟他说话？”意思是说，先生说话太不顾忌彼此身份。先生大眼圆睁，瞪着副局长道：“我这岁数，他那年数，我都快能给他当爹了——这样说话怎么不行？”先生天然大嗓，秘密话也说得回声嘹亮。副局长甩开几步，径直走在前面，再不敢多说一句话。

凤梧先生到官场不讲规则，在普通百姓面前也同样没有禁忌。与百姓混成一片是凤梧先生多年的习惯，或许那是他的天性吧。

我在北大寺住的那幢楼里，同时住了若干县领导。一日清早，凤梧先生敲开我家的门，说：“来早了。先顺道瞧瞧徒弟，一会儿再上去瞧哪位领导在。”熬了一会儿，先生起身告辞，往楼上敲哪位领导家的门去了。大约两小时后，我到街市上买菜，远远听见一个熟悉的嗓门吆喝：“卖西瓜嘞——正经的沙瓤儿大西瓜，不甜不要钱啊！”

依声寻去，见凤梧先生守在一个西瓜摊后，上身只着一件“跨栏儿”背心儿，一边摇着摊主的芭蕉扇，一边不住声地叫卖。不用说，从领导家出来的先生又到街上体察民情了，且与摊主聊得投机，执意要为他卖一会儿。果然，这一带多过往些公职人员，多有认得先生的，见了便诧异地问他：“哎，王老，您怎么改行卖瓜了？”先生哈哈笑道：“不是讲究‘老王卖瓜’吗？没说的，买一个吧！”那口气绝对不由分说。恰逢一个领导从集市西边走过来，且已有一个西瓜在手了。凤梧先生道：“来一个吧！”领导说：“这玩意儿现吃现买，弄两个吃不完。”先生道：“你那个半道儿可以扔了，尝尝正宗的老王的瓜。”草草称了称，高些报了分量、钱数，然后伸手道：“交钱呗您呢。”领导交过钱，忽有所悟：“不对呀王老，您的瓜怎么比别家的还贵呢？”先生笑道：“贵就对了，老王的瓜——杀熟！”一边说一边把收的钱转手给了一旁的摊主。如此这般，一车西瓜转眼便光了。

## 五

凤梧先生的人生态度几乎是一种罕见的豁达。

譬如划右派之时，上级暗示他好好写份检讨，便可免戴那顶帽子了。先生刚直不阿的性格那时显露无遗，断然拒绝检讨；然后戴了那顶帽子，坦然回家务农改造去了，这一去便是 20 年。在其他右派眼里，那几乎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但凤梧先生每每提及这段往事，却是一副津津乐道、眉飞色舞的样子。他说：“我干嘛要怨天尤人呢？你看，我这身子骨多棒！这是拜 20 年劳动所赐啊。”他在文章中多次写到改造生涯，却从未抱怨命运的不公，字里行间多是对土地和乡亲的感念之情。但是，即使乡亲邻里如何呵护，被批判和写检查却是躲不过的，只是形式不那么野蛮罢了。一次从批斗会上回来，家人开始愤愤不平地议论：谁的批判稿说得狠了，哪个批得重了，尤其那个大队干部，怎么像跟您有仇似的？凤梧先生坦然安慰说：“既是批斗会，总得有人要上台发言；这个不去那个上，好歹得说点什么。你们发现没有，倒是那个大队干部，那发言稿写得有水平。”一席话，说得一家人哭笑不得。

以凤梧先生的刚直率性，免不了要得罪些人。他给作者评稿，向来都是直来直去，常有作者听得面红耳赤，不定哪个就金盆洗手，从此不再染指创作了。但对此先生大多浑然不觉。或者，事间激昂；事后不定在哪个时段遗忘了。

房山文人大都知道日升先生和凤梧先生有过一段过结，其中原委现在看来不过是小事一件，但二人感情却很是交恶了一段时间，当时几乎成了房山文坛的一桩公案。到日升先生晚年的时候，有心与凤梧先生和好。恰其时，文联主席史长义和我也有意化解二人的关系，遂陪日升先生一起拜访了凤梧先生。两位先生一见面便握手寒暄，当然是日升先生率先伸过手的。然后日升先生便反复地说些宽容的话，大意是：以前那点儿事什么谁对谁错的，都过去了；风物长宜放眼量，咱们的日子还能有多长？我看见凤梧先生怔了一下，然后转过头茫然地看着我，眼里的意思似乎是在等我给他解释：“他说的‘那点儿事’究竟是些什么事？”先生显然已经不记得和日升先生之间有过什么事了。既然无“事”，那也便不需要化解什么了。此类人事，肯定不只这一件。

凤梧先生在进入“耄耋”前几年，血栓了一下，并不严重，只是“栓”住些近年的记忆。在先生血栓后我几乎每年都去看他，到今年春节时发现，他几乎已经把所有与人有过的摩擦都“栓”去了，但久远些的美好记忆却还储存着……

## 六

与“第二春”时的“绽放”比较，凤梧先生的自然“凋零”更让我震撼！

以当初凤梧先生对文学创作的执著，对参政议政的热衷，很难想象日后能放下它们。我从未见凤梧先生修过此类法则，但他后来却能如此放得下！

凤梧先生首先放下的是政治。随着他的代表资格到届满时终止，先生便再也不用写那些庄严的议案了。当然还有人或单位找他办些事情，但多被先生推辞了。我问先生：“您怎么说不管就不管了？”先生淡淡地说：“不在其位，不谋其

政。”既然不用再“督办”、“催办”什么事，那先生自然便不需要在官场间穿梭往返了；他只需忘形在百姓里便可以了。与百姓混为一片，却并非是为了获取创作的素材。那是一种天性。

接着放下来的便是文学了。其实，凤梧先生当了代表之后已经放下了一些，只是并非主动。短暂而繁忙的政治生涯迫使他从文学创作里腾挪出一些必要的时间来，以保证神圣地参政议政。此前，凤梧先生继《露珠》系列之后，在创作题材上又开辟了一片“反右”领域，便是后来证明并不成功的《头三脚》系列。当时先生集众家批评，正在思索纠偏的方法。但这一参政，先生的创作空间便被进一步地压缩，再没有纠偏的机会了。

荒着《露珠》不续，又不见从《头三脚》下回头，做弟子的自然便委婉地说了。先生却少见地叹了口气，说：“老了，心有余力不足了。”我说：“您不老，您看您身子骨多棒啊，您是老当益壮啊。”先生说：“屁！老当益壮，那是理想！”

现在想来，那时的先生已经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

凤梧先生彻底地放下文学是在《大房山报》停刊之后。《大房山报》是和《青峰》同时停刊的，但它的命运却比《青峰》更加不幸——从创刊到停刊只生存了几年的光景。凤梧先生在房山纵横驰骋了十年之后，在家庭之外的最后一块根据地宣告失守；先生别无选择，只有回家。回家后的先生便完全地放下文学，做纯粹的百姓去了。

凤梧先生最后放下的当然是生死。既然生由不得人，那么说白了便是放下死亡。这是大多数人到死也不能放下的，但先生却放下得那么潇洒，那么不露痕迹。

其实早在我们师徒二人编刊的时候，便对死亡有过非正式的讨论。有一次我在一篇歌颂革命先烈的稿件上连改了两个形容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先生定稿时改成了“大义凛然，英勇就义。”我心说：不都是死吗？先生似乎听到了我心里的话，说：“大义凛然是一种气概，是面对敌人的无畏，所以结果就是英勇就义；而视死如归是什么呢，是把死看成回家一样，是面对死亡时的一种平和心态。既是回家，那还要什么气概呢？何必大义凛然呢？而且你还用了叹号，那可不是视死如归的本意啊。”

那一次，先生让我在词义上理解了视死如归的理论含义。

二十多年后，先生又用自己的生命为我诠释了视死如归的生理意义。

10月13日上午，先生在床上半坐半卧——倘若不是虚弱的缘故，先生一准是要端坐的；所以家人并未觉得有什么异常。但先生开始摆手招呼他们，家人方才紧张起来。同样是虚弱的缘故，先生已经说不出话了；或者，因为以前语言应用了太多的缘故，先生已经不再需要语言了。待家人齐聚了，先生使用手跟他们比划交待。我估计一定是按既定方针办一类的意思。11点18分，凤梧先生放下生命，无牵无挂地驾鹤西去了……

刘泽林：区文联副主席、作家协会主席